

# 第一章 元朝统一和元代 蒙古人的分布

## 第一节 建国号“大元”，平定 南宋条件成熟

### 一、建国号“大元”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创建国家，称“也客·蒙古·兀鲁思”即“大蒙古国”。这实际上是以族名作国号。汉文文献则习惯称为“大朝”<sup>①</sup>。本书第一卷统称蒙古汗国。

<sup>①</sup>肖启庆《说大朝 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载《汉学研究》（台北）第3卷，第1期，1985。

1260年忽必烈和他的胞弟阿里不哥分别在开平、和林几乎同时宣布即大蒙古国汗位。忽必烈立足于中原，凭借中原雄厚的财力、物力，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改革旧制、推行汉法势在必行。然阿里不哥据祖宗根本之地，标榜维护蒙古旧俗，忽必烈行汉法又必须小心谨慎步步为营。1260年三月他在上都即位称汗，四月以即位诏颁天下，诏云：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

五月，下诏宣布建元“中统”：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纁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sup>②</sup>

忽必烈自即位，到颁即位诏宣布“祖述变通”的施政方针，到采取第一个重大政治措施，建元中统，前后差不多用去两个月，诏书又反复强调“祖训”，声称“稽列圣之洪规”，此皆足以透露他谨慎小心，不敢贸然背离祖宗国俗的心态。但他必须前进，“祖述变通”。所谓“变通”就是“讲前代之定制”，实行中原王朝传统的政制，推行汉法。按中原传统，建元乃开国的头等大事。经过近两个

《元史》卷4《世祖纪一》，中华书局点校本。

《元史》卷4《世祖纪一》。

月小心翼翼的探路，忽必烈宣布建元，在实行汉法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但是建元开国，应该有相应的国号，忽必烈年号虽建，国号则仍沿用“大蒙古国”。1266年中统改为至元已经3年，忽必烈致日本国国书仍称“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sup>①</sup>云云。面对蒙古贵族内部以相当一部分宗王为核心的坚守蒙古旧俗的保守势力，忽必烈的步伐不敢迈得太大。

经过中统、至元初多年经营，忽必烈的地位稳固了。1271年（至元八年）汉儒臣刘秉忠、王恽等人提出了国号问题。现在可以见到的王恽《建国号事状》云：

伏见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国号，以明肇基之始。方今元虽纪而号未立，盖未有举行之者，是大阙然。<sup>②</sup>

于是忽必烈宣布“建国号曰大元”。诏曰：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称著；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为国，有不义而称制。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事，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

<sup>①</sup> 《元史》卷208《日本传》。

<sup>②</sup> 王恽《建国号事状》，《秋涧集》卷86《乌台等补》，四部丛刊本。

心乎所有。可建国号曰大元 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在元世祖君臣看来，他们的政权既然膺命承运，奄有四海，成于大业 就应该有“美名”、“鸿名”作为国号 以副其实；“绍百王而纪统”成为中国正统王朝序列中的新成员。建国号大元 与年号等联为一体，标志着国家建号制度中全面采取了汉族的模式 并采用了汉语的称谓”<sup>②</sup>。同时也标志着，一个主要立足于中原，基本上采用汉制，即中原传统封建模式，以确保蒙古贵族统治地位和特殊利益的政权，已经建立起来。

建国号大元，在当时还有另一层意思。诏书宣称，国号要有“美名”秦汉隋唐 或由地名 或取封邑 皆非至公。言外之意，“蒙古”族称而已 不是他们所理解的国号。在灭金、征服中原的过程中，蒙古骑兵杀戮、虏掠，给广大汉族人民，以及汉化很深的渤海、契丹、女真人民留下了不愉快的记忆。“大蒙古国”以族名作国号，只是统治民族的国家，且与这种不愉快的记忆相伴，十分不利于蒙古贵族政权的稳固 更不利于即将进行的灭亡南宋的战争。以“大元”在汉语里取代“大蒙古国”实际上也是出于弥缝民族矛盾的政治需要。

根据蔡美彪先生的研究 建大元国号以后，“大蒙古国”的称号，“仍在蒙古族中继续引用 直到元朝末年 迄未废弃”而且往往是同时并存，两号并用。比如，1335年（元统元年）张氏先莹碑 碑额以八思巴蒙古字译写汉语 国号作“大元” 碑文以蒙古畏兀字写

《元史》卷7《世祖纪四》。

蔡美彪《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载《南开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蒙语 国号作“大蒙古国”。1338年竹温台碑 蒙古畏兀字碑文 叙大元官职 作“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1362年忻都碑 蒙古畏兀字碑文书写大元官职时作“大元大蒙古国”，引文叙事仍作“大蒙古国”。结合年号、纪年、谥号、庙号考察 元代的国家建号制度 实际上存在着蒙汉两重体系。汉制体系 大元国号——汉语皇帝庙号、谥号——汉语年号干支。蒙古体系：大蒙古国（大朝）——蒙语大汗尊号、庙号——十二生肖纪年。“这两种体系同时并存 蒙汉互译，形成蒙古国家制度的一大特点”<sup>①</sup>。

## 二、灭南宋，实现大一统的决策

我国自 10 世纪初唐朝灭亡 200 多年来，五代十国，辽宋金夏，皆相继立国一隅 征伐混战岁无宁日。“各土其地 各分其民 事乎此者则遗乎彼，谋于北者则不及南。一元之气散，而兆人被其害”。广大人民长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开始探寻社会的出路。郝经说：“天下之祸 始于天下之不一。”因此要撤天下之“藩篱”，破天下之“畦町”，除天下之“疆界”，用“大一统以安天下”<sup>②</sup>。类似的呼声日益强烈。

忽必烈早在潜邸时，便产生“有用于天下”的壮志。在国家长

蔡美彪《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载《南开学报》1992年第1期。文中所引各碑影具见道布编《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1983年。美国柯立夫对各碑铭有译释，分别于哈佛《亚洲学报》第13、14、15页，1950、1951、1952年。此处皆由蔡先生论文转引。

郝经《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9。影印《四库全书》本。

期分裂的大背景下，耳濡目染，受其祖父、父辈、兄长还有“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sup>①</sup>的影响，大一统观念逐渐形成。

1260年三月忽必烈即大汗位“建元中统”。《中统建元诏》云：“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sup>②</sup>。表现了“天下一家”的愿望。

1271年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进一步提出“予一人底宁于万邦”且以“大之至也”的“元”作为国号。他要完成大一统的事业了。

1260年（中统元年）给高丽国王的制书云：“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指高丽）与宋耳”<sup>③</sup>。1271年建国号时高丽已经依传统纳款称臣，成为元朝附属国。剩下的只有南宋了。1267年（至元四年）刘整对忽必烈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世祖回答：“朕意已决矣。”<sup>④</sup>平定南宋统一江南实现“大一统”的最后一战就要开始了。

蒙元对南宋的战争始于1227年（成吉思汗二十二年）时蒙古汗国伐西夏的一支军队破金朝辖地临洮，来到南宋蜀边地区，克阶州，包围西和州，大战皋兰城，南宋军连败。后来，蒙古联宋灭金，二者对立关系并未缓和。1234年（窝阔台六年）金朝灭亡次年即派三路大军进攻南宋。蒙哥大汗对南宋战争更加频繁，并制定

① 《元史》卷4《世祖纪一》。

② 《元史》卷4《世祖纪一》。

③ 《元史》卷208《高丽传》。

④ 《元史》卷161《刘整传》。

了灭亡南宋战略计划。1258年亲自率主力4万,号称10万,进入四川。<sup>①</sup>但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顿军于合州城下,死在那里。

在蒙元与南宋的战争中,形成川蜀、荆襄、江淮三大战区。汗国对川蜀战区一直予以高度重视。蒙哥制定了图川蜀、灭南宋的战略计划:占领川蜀,然后顺长江而下,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取长江中游的荆襄之地,位于长江下游的江淮乃至吴越之区,唾手可得。然而几十年的战争,虽占领了南宋一些土地,削弱了其防御能力,但多为战役性胜利,没有达到灭南宋的目的,自身亦损耗很大。能够横扫亚欧许多国家的汗国大军,对付已经腐败的南宋政权时,却如此吃力,原因何在?据大谋士郝经分析,并不是士气不锐,力量不强,土地不广,而在于“其术则未尽也”,应当“重慎详审,图之以术”<sup>②</sup>。这里的“术”,当是指战略;“术未尽”系指战略不完善。其实,无论是先取川蜀,还是重点取川蜀,都要将大量军队投入到受地形限制的川蜀地区,而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这支重要力量被拖住,势必直接影响以后一系列军事行动。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忽必烈不能不考虑新的战略。

1259年,尚为亲王的忽必烈受命攻宋。在相州问计于隐居多年的杜瑛,杜瑛答:“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兴之在圣主。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搆其背,大业可定矣”<sup>③</sup>。忽必烈听后,非常高兴。

① 《元史》卷3《宪宗纪》。

② 《元史》卷157《郝经传》。

③ 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23~141页。

④ 《元史》卷199《杜瑛传》。

郝经闻蒙哥在川蜀师久无功，于 1258 年向忽必烈进言，针对南宋“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的原则，提出“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战略：“命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济师”；以轻兵掇襄阳，绝其粮路，重兵皆趋汉阳，出其不意，以伺江隙”；然后再“溃两淮之腹心，挟长江之襟要”，直取“京畿”。

忽必烈即大汗之位后，郭侃上平宋之策：“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州，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sup>②</sup>

1263 年（中统四年）南宋降将刘整进言：“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后来又云：“一旦襄阳破，若将所练水军，乘胜长驱，长江必皆非宋所有”，则临安摇矣”。

杜瑛、郝经、郭侃和刘整等从不同角度提出平定南宋的战略。虽然细节有所不同，但大体都从襄阳入手，沿汉水南下，顺长江东进，直取临安。然后再解决江淮和川蜀。其实，这个平宋战略，在此之前，李桢向贵由汗，术速忽里向蒙哥汗先后提出过。可惜的是都没引起这些决策人物的重视，甚至还遭到一些人的讥讽。<sup>④</sup>现在善于集中大家智慧，努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元世祖终于将这些正确意见作为新战略确定下来。战略上的改变，加速了战争的进程。

① 《元史》卷 157 《郝经传》。

② 《元史》卷 149 《郭侃传》。

③ 《元史》卷 161 《刘整传》。

④ 《元史》卷 122 《李桢传》；《元史》卷 129 《来阿八赤传》。

元世祖在《建国号诏》中宣称自己“奄四海以宅尊”<sup>①</sup>，绍百王而纪统”。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正统君主，他此次发动征服江南的战争，自与昔日蒙古汗国的一系列战争不同。消灭南宋政权，占领这一地区，是完成大一统的最后任务，而在征服江南的过程中，保护那里繁荣的经济和高度发展的文化，赢取这块土地上的人心，对于大一统王朝的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这一点忽必烈有清醒的认识。

蒙古，作为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文化是陌生的。蒙古军队刚刚进入中原即金朝领土的南部时，仍以剽掠为业。虽有人高呼“止杀”、“禁掠”，但实际上改变不多。半个世纪来，经过许多人包括蒙古贵族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战争中的杀掠行为日渐减少。现在，大一统元王朝的开国君主要认真结束这种掠夺和滥杀的野蛮行径了。

平定南宋，征服江南的战争，是否能够圆满完成军事的和政治的战略任务，关键是统帅人选。在当时元朝高级将领群体中，能够完成军事征服之任者大有人在。然而既能军事征服，又能保护江南经济文化，争得民心者，实是难寻。中书左丞相、平章军国事史天泽提出，自己年岁已高（是时 73 岁）不宜承担此重任，并举荐在安童、伯颜中择一人，自己愿当副手。世祖经反复认真考虑，最后选择了“深略善断”<sup>①</sup> 忠勇宽仁的伯颜。世祖对伯颜说：“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下江南。汝其今体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sup>②</sup> 称尚在南宋政权下的百姓为“赤子”，并要求统帅伯颜像曹

① 《元史》卷 127 《伯颜传》。

② 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载《元文类》卷 24，四部丛刊本。

彬一样保护他们。曹彬是北宋初年以“仁敬和厚”著称的将领，曾率军灭后蜀、后唐两个割据政权，身经百战，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妄杀一人”<sup>①</sup>。特别是平定后唐过程中，其儒帅风范，历史上传为佳话。世祖要求伯颜学习曹彬，成为曹彬这样的统帅，反映了这位皇帝征服人心的主张。

为了统一领导，伯颜又受命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所属并听节制。于是伯颜不仅是元军统帅，而且还是河南等路最高行政长官。赋予战时一切军事、行政大权，以确保军事和政治总战略的贯彻。

### 三、灭南宋条件成熟

忽必烈即大汗位之后，在诸儒臣协助下，大体按中国封建传统，逐渐建立起与较高的封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迁都燕京，建大元国号，以正统自居。与此同时，调整赋税徭役，奖励生产，兴修水利，赈济灾民，招抚流亡。积极屯田，且战且耕，减轻人民军需负担。中原北部因蒙金战争而破坏了的生产逐渐恢复，社会秩序日见安定，使饱尝50多年兵燹之灾的中原人民得到喘息。西北诸王的叛乱虽然没有了结，但阿里不哥之乱平息后，在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都已经有了较为妥善的部署。另外，对大理、吐蕃的经略成功，从南部完成了对南宋的包围。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元朝都具备了充分的灭亡南宋的条件。

为了这场战争，元廷签军10万，制造战舰、运输船至少六七千

<sup>①</sup>《宋史》卷258《曹彬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艘。伯颜所领主力 20 万，<sup>①</sup> 粮草、盔甲、军械等军需供应，十分可观。这些大体由中原北部承担。元初中原经济的迅速恢复，以及在统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

骁勇善战的骑兵几乎是蒙古唯一的兵种，所向无敌，但是在对南宋的战争中，骑兵却暴露了严重的弱点。南宋地区遍布江河湖泊，水系成网，稻田广布，骑兵的迅猛、机动等特长在这里无可施展。面对这种情况，元世祖在军事上做了重要改革，加强步兵，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和水陆两用兵，配备蒙古将领学习水上作战的经验。

创建水军和水陆两用兵，一是靠自身力量。蒙古汗国前期，水军很少，它与炮军、弩军并列，合称“技名者”<sup>②</sup>。约 1266 年（至元三年）河南等路行军副使董文炳受命“造成舰数百艘，肄水战，预讲取宋方略”<sup>③</sup>。襄樊之战，特别是元朝建立后，造战船，练水军的工作进一步加强。据刘整意见，“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以习之，得练卒七万”<sup>④</sup>。兴元、金州、洋州、汴梁等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sup>⑤</sup> 1273 年（至元十年）六月，“敕襄阳造战船千艘”。翌年二月，汴梁造船 800 艘。<sup>⑥</sup> 水军不断壮大，装备也比较讲究。一是蒙古将士逐渐兼备多兵种的战斗技能，既会骑马冲锋陷阵，又能驾船乘风破浪。二是整编南宋水军。1274 年（至元十一年）十二月阳罗堡之战，缴获战船千余艘。翌年二月丁家州之战，夺

① 《元史》卷 127《伯颜传》。

《元史》卷 98《兵志一》。

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 70。

《元史》卷 161《刘整传》。

⑤ 《元史》卷 8《世祖纪五》；《元史》卷 161《刘整传》。

⑥ 《元史》卷 8《世祖纪五》。

得战船的 2000 余艘。<sup>①</sup> 陆续俘虏、招降南宋大量水军 其中多数改编成元军。

经过不断努力 元朝水军数量大幅度增长 质量也显著提高。有关战区几乎都配备水军。仅刘整一人就统领水军 4 万户 宋军惮为劲旅。<sup>②</sup> 1276 年十月 置水军都万户府于昆山州 以纳麟哈刺为正万户 董搏霄为副万户。1277 年二月 立镇江水军万户府 命佛家闾领之。<sup>③</sup> 可以判定 在元朝伐宋时 已拥有一支较强的水军 扭转了汗国时代“水战不如宋”的形势。<sup>④</sup>

元朝水军建立并成为独立兵种后 立即投入激烈战斗。骑、步、炮、水各兵种 都有长处 也都有短处。水军与其它兵种取长补短，互相支援 联合作战 形成比单一兵种强大得多的综合性战斗力。伐宋战争中，水军立有大功。一些世代骑射的蒙古将士，现在也成了精通水战的劲旅。

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至宋理宗赵昀（1224~1264 年在位）时 腐败之势已不可挽回。理宗“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 权移奸臣”。宰相“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 与相始终”<sup>⑤</sup>。理宗对史弥远 因有“立己之功” 多方掩饰其“奸恶” 使“独相九年 擅权用事 专任 佞王”<sup>⑥</sup>。丁大全是个无耻的文人 以攀附受宠的宦贵妃和号称“董阎罗”的宦官董宋臣而幸进；奸回险狡 狠毒贪残。

① 《元史》卷 127《伯颜传》；《元史》卷 8《世祖纪五》。

② 《元史》卷 161《刘整传》；《宋史》卷 474《贾似道传》。

③ 《元史》卷 92《百官志八》。

④ 《元史》卷 161《刘整传》。

⑤ 《宋史》卷 45《理宗纪·赞》。

⑥ 《宋史》卷 414《史弥远传》。

与阎贵妃、马天骥共用事”匿名者写八字于朝门：“阎马丁当 国势将亡”<sup>①</sup>。监察御史饶虎臣论丁有四罪：“绝言路 坏人才 竟民力，误边防”<sup>②</sup>。贾似道靠姐姐贾贵妃迅速迁升 直至宰相。任相 16 年中 做尽了坏事 度宗赵禔即位后 专权尤甚。朝臣称其为“周公” 度宗则呼为“帝师”。率师援鄂 与蒙古私订称臣、输币之密约 并谎报大捷。无耻之徒交通贿赂 纷纷致身通显；“一时贪风大肆”<sup>③</sup>。正义直言之士，辄加排斥，或流放边远，或终身不录。兵丧于外，匿不以闻。有一次度宗问：“襄阳已围三年矣 奈何？”贾言：“北兵已退 陛下何以得此言？”度宗只好如实说是一嫔女告知。贾即诬杀嫔女。<sup>④</sup> 前线日益紧迫 战报频频传来 但为贾属下扣压 朝臣无敢言者。国难当头，民怨鼎沸，岌岌可危，但贾似道仍沉溺于享乐。率兵救襄阳时 本来救兵如救火 却不敢接战；“日坐葛岭 起楼阁亭榭 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 日淫乐其中”且“与群妾踞地斗蟋蟀”。连身边的同流小人都说：“此军国重事邪？”<sup>⑤</sup>

统治阶级奢侈腐败 浩繁的战争费用 以及自然灾害等 使南宋经济危机日益加深。人民负担沉重，除夏秋两税外，还有繁多的苛捐杂税；“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田契钱、称提钱、折估钱、免行钱、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帐钱、保正牌限钱，以及折纳牛皮、牛筋、牛钱等等名目”<sup>⑥</sup>。百姓深苦于交不完的

《宋史》卷 474 《丁大全传》；《宋史纪事本末》卷 97 《董宋臣丁大全之奸》。

《宋史》卷 474 《丁大全传》。

《宋史》卷 474 《贾似道传》。

《宋史纪事本末》卷 105 《贾似道要君》，国学基本丛书本。

⑤ 《宋史》卷 474 《贾似道传》。

⑥ 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303 页。

赋 纳不完的税。“江南之地 尺雨皆有税 而民力弊矣”<sup>①</sup>。

南宋灭亡前夕，即使正税也极不合理。那些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还有御前寺庙道观，凭借特权勾结官府，兼并大量土地，逃避两税。巨量税额又转嫁百姓身上 逼得百姓走投无路。侍御史陈坚、殿中侍御史陈过等于 1274 年（咸淳二年）上奏：“今东南之民力竭矣……邸第戚畹、御前寺观，田连阡陌，亡虑数十万计，皆巧立名色 尽蠲二税。州县乏兴 鞭挞黎庶 鬻妻卖子 而钟鸣鼎食之家，苍头庐儿，浆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优游死生”<sup>②</sup>。

滥发会子（即纸币），且规定新会子一贯兑换旧会子二贯，又给百姓增添一害。会子越来越多，又无法向政府兑换，币值下跌，通货膨胀，百姓吃亏，发行会子已成为政府搜括的又一种手段。1263 年（景定四年）由贾似道主持推行公田法。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超额者，以官方名义按数量抽买，多以贬值的会子给值。对抗拒者“至以肉刑从事”。实施十余年，“浙中大扰”，一路骚然。<sup>③</sup>中小地主遭到打击，但那些豪门之家仍未受到触动。

南宋的政治腐败，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面对蒙元这个强大的敌人又不知奋发图强。内部各种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蜀中地震，浙闽大水之后，监察御史洪天锡高声疾呼，目前国家已是“上下穷空 远近怨疾”<sup>④</sup>。国子监主簿徐宗仁上书：“天下之事势急矣 朝廷之纲纪坏矣”；“兵虚将堕 而力匱

① 《宋史》卷 474 《贾似道传》。

② 《宋史》卷 174 《食货志上二》。

③ 《宋史》卷 474 《贾似道传》。

④ 《宋史》卷 424 《洪天锡传》。

财殫 环视四野 类不足恃’<sup>①</sup>。但在昏浊的气氛之中根本无人重视。南宋政权已失去自我调节机制，其灭亡指日可待。

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主观、客观各方面看，元朝即将进行的这场平定南宋，征服江南战争的条件已经成熟。

1273年(至元十年)二月 经历6年之久的襄樊之战以胜利告终。元朝将相大臣纷纷要求南下伐宋。四月 元世祖主持重要会议。从前线归来的将领阿里海牙，降将吕文焕，还有姚枢、许衡、徒单公履等参加。徒单公履言：“乘破竹之势 席卷三吴 此其时矣。”世祖表示同意。<sup>②</sup> 1274年正月 再次召开会议 研究伐宋事宜。阿里海牙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 汉水上流已为我有 顺流长驱 宋必可平。”阿术又言：“臣略地江淮 备见宋兵弱于往昔 今不取之 时不能再”<sup>③</sup>。一场新的统一战争开始了。

## 第二节 灭亡南宋 完成统一

### 一、水陆并进，顺流而下

1274年(至元十一年)六月 元世祖颁《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军

① 《宋史》卷425《徐宗仁传》。

② 《元史》卷8《世祖纪五》。

③ 《元史》卷8《世祖纪五》。

官诏》。诏书以南宋扣留使者郝经等为理由“兴师问罪”。特别强调“将士毋得妄行杀掠”。又说“若彼界军民官吏人等去逆效顺，与众来陈，或别立奇功者，验等第官资迁擢”<sup>①</sup>。

按新战略的部署，伯颜领兵20万，从襄阳出发，浮汉水，进长江，直取临安，肩负平宋的基本任务，是为主力。九月，伯颜、史天泽不久，史天泽因病重召还，率主力军水陆并进，旌旗延袤，战船蔽江，前后百里。大体同时，以合达（或写作合丹）为首，包括刘整、塔出、阿里海牙、董文炳等率一军由正阳（今安徽正阳关）出发，指向以庐州（今合肥）为中心的淮西地区。以孛鲁欢为首的淮东元军、以汪良臣为首的西川元军、以合剌为首的东川元军亦展开攻势，以牵制、阻截南宋军，为伯颜主力军提供支援。伯颜等檄谕南宋州郡官吏军民等开城投降。于是在川蜀、荆襄、江淮三大战区，东西几千公里，战争全面展开。

南宋都统制张士杰在郢州（今湖北钟祥县）设防。该州城位于汉水北岸，城墙用石砌成，高如山，矢石不进。汉水南岸又筑一座新郢州，两城隔水相望。水中密插桩木，战舰千艘贯铁索以横江。士杰力战，元军不能前。伯颜详细考察地形，派军攻取汉水畔的黄家湾堡，凿壩，陆地拖船，通过该堡西的沟渠进藤湖荡，由藤湖荡入汉水。绕过南宋军在郢州的坚固防线，继续前进。

元军至沙洋，三次招降守将王虎臣、王大用。二王拒降，焚黄榜，杀欲降者。元军用金汁炮轰城，二王被擒杀，余悉屠之。至新

<sup>①</sup> 《元文类》卷9，四部丛刊本。其内容与《元史》卷8《世祖纪五》所载，略有不同。

城，射黄榜、檄文至城中招之，吕文焕又于城下劝降。守将边居谊杀降者，飞矢伤文焕。元军破城，边居谊及所部三千壮烈牺牲。

十二月 以阳罗堡为中心的战斗颇具规模。阳罗堡在今武汉北，自古以来就是长江重要渡口。南宋淮西制置使夏贵与当地驻军配合，以将士数十万，战船万艘分据要害。都统王达率重兵守阳罗堡，京湖宣抚朱 禔孙以机动水军扼中流阻挡元军。元军佯称由汉口渡江，诱夏贵以重兵防守对岸汉阳。伯颜乘机遣奇兵夺沙芜口，并在汉口开坝，引船入沦河，经沙芜口进入长江。围阳罗堡，堡内宋军拒绝招降 连攻三日不克。元遂以船载铁骑泝流 40 里至青山矶 大败南宋守军，获战船千余艘。元军战船相衔，直抵夏贵军。夏贵闻青山矶已陷，大惊。元军趁之，斩溺不可胜计。猛攻阳罗堡，破之，斩王达。“宋军大溃 数十万众 死伤几尽”<sup>①</sup>。朱 禔孙闻阳罗堡失守，夜归江陵。吕文焕等对鄂州、汉阳发动政治攻势，南宋知鄂州张晏然、知汉阳军王仪、知德安府来兴国、荆鄂都统程鹏飞皆以城以军降。留阿里海牙领 4 万军守鄂，取荆湖。元军继续东进。

南宋朝廷得悉鄂州失守，大惧。群臣要求“师相”贾似道亲领兵出征，贾不得已应之。这位南宋军政首领毫无退敌之策，遣使要求归还已降州郡，愿称臣，纳岁币，如开庆时签订的条约。伯颜拒绝 并表示：“未渡江 议和入贡则可 今沿江诸郡皆内附 欲和，则当来面议也。”<sup>②</sup> 贾似道何敢到元军面议！

贾调诸路精兵 13 万 金帛辎重 舳舻相接百余里 逆江而上。

《元史》卷 127 《伯颜传》。

② 《元史》卷 127 《伯颜传》。